

池田大作软实力

理论研究



王虹 黄顺力 王伟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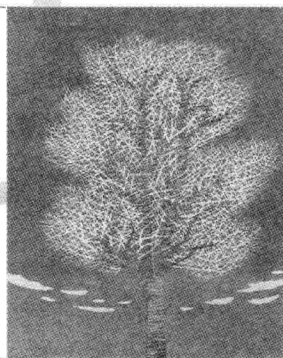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池田大作ソフト・パワー理論研究

池田大作软实力 理论研究



王虹 黄顺力 王伟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佛教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诗人、摄影家、世界文化名人、国际人道主义者。他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学说的第二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讲演,其题目是“ソフト・パワーの時代と哲学(软实力时代与哲学)”。他所倡导的思想理念和为世界作出的贡献完全与软实力理论水乳交融,不仅对当时那个年代也对当今中日关系的改善乃至亚洲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永久和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以他开创教育、开展文化交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世界和谐与人类和平这三条主线透析池田大作的思想理念,阐述他的软实力理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池田大作软实力理论研究/王虹,黄顺力,王伟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09-9666-0

I. ①池… II. ①王… ②黄… ③王… III. ①池田大作-思想评论 IV. ①K833.137=6



池田大作软实力理论研究

王 虹 黄顺力 王 伟 著

策划编辑:钱 坤

责任编辑:刘 亭

封面设计:刘 卉

责任校对:马燕红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252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来自池田大作先生的激励

Daisaku Ikeda
Founder



Soka University

1-236 Tangi-cho Hachioji Tokyo 192-8577 JAPAN
Tel:(0426)91-8200 Fax:(0426)91-2039

尊敬的王虹教授

您好！此次承蒙王教授致予郑重信函，诚为惶恐。

过去，王教授作为交换教员曾在创价大学进行半年的访学研究，期间对本校以及创大生给予莫大的鼓励与支持。作为创价大学的创办人，在此谨向您表示感谢。

此外，以王教授为首贵厦门大学最优秀的研究者们，对我们所宣扬的和平理念深表赞同并对此进行研究。为此，我感到与诸位缘分至深并感到无比欣喜与光荣。相信创价教育的先师牧口常三郎先生和户田城圣先生也一定感到十分欣慰。

关于贵校与本校进行共同研究事宜，也已向创价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传达，企盼今后贵校能与创价大学保持密切协作关系。

我与妻子衷心祈愿诸位的身心健康、研究成绩硕果累累，以及肩负未来大中国教育界与学术界重任的王虹教授愈益活跃、康泰。

创价大学 创办人

池田大作

2009年5月18日

引言

王虹

“软实力”(soft power)又称“软国力”、“软权力”、“软力量”,指的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①“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其中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克林顿时代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Nye)。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世界中力量的本质》(*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软实力》(*Soft Power*)等一系列论文,以此为基础出版了《注定领导世界:美国实力的性质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明确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十年之后,在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走向巅峰之际,他出版了《美国实力的悖论:为什么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法单独行动》(*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书,此书成为他软实力理论的代表作,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软实力论成为反战运动者的理论支撑。^②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进一步论述了“软力量”思想。

日本是最早关注到软实力建设的国家之一。在日本软实力及其研究的发展历史中,不得不提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日本创价学会的创始人、现任创价大学名誉校长池田大作,他是在日本倡导软实力的第一人。他在约瑟夫·奈提出这一学说的第二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其题目是“ソフト・パワーの時代と哲学(软实力时代与哲学)”,他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软实力对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在他的带动下,关于软实力的译作著书层出不穷,大学建立起软实力

① 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张晓慧:《“软实力”论》,《国际资料信息》第3期,2004年。

研究所,日本对软实力的研究逐渐发展壮大。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佛教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诗人、摄影家、世界文化名人、国际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波澜壮阔,在促进中日友好和倡导世界和平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并积极投身文化和教育交流,为推动世界和谐与人类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池田大作之所以能最早关注到“软实力”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根源于他始终不渝的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池田大作的世界和平观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根绝所有暴力,倡导积极的和平主义;二是反对一切战争,追求绝对的和平主义;三是彰显生命尊严,奉行彻底的和平主义。^① 这一世界和平观的理论除了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外,还是建立在其人本主义的哲学观点、反对暴力的东方价值理念、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基础上的。^②

池田大作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与“软实力”论找到了契合点,就是一种“兼爱非攻”、“以德服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而非威逼利诱、穷兵黩武。硬实力是强制他国的力量,软实力则是吸引、劝服他国的能力。硬实力凭借的是军事和经济手段,而软实力则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魅力。所以说,池田大作的终极追求与软实力理论的内涵正好不谋而合,这也是池田大作最先关注到,并积极倡导软实力的原因所在。

回顾池田大作的一生,其对促进中日友好、倡导世界和平和对文化教育交流的卓越努力,其实正是日本战后软实力恢复和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并非刻意的,为日本软实力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正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探讨中日关系、进行软实力建设的参考。

本书力求完整、全面细致地研究池田大作与软实力论,但因在中国获取资料和研究环境等多重因素所限,仅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我亦称扬友谊樱,永不凋谢在心底^③——池田大作作为日中恢复邦交所做的贡献

一、“池田倡言”

毋庸置疑,池田大作是公开提出中日复交的第一人。

1968年9月8日,在东京的日本大学讲堂召开了创价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总

^① 杨君游、苏卫平、蔡德麟:《论池田大作的世界和平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深圳大学出版社中心。

^② 江传月:《世界和平: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东疆学刊》2008年7月。

^③ 《樱花缘——赠邓颖超女士》,见池田大作著,《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会,池田大作在演讲中,发表了重要的倡言。内容包括:①日本政府应正式承认中国政府,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努力。②联合国应该为中国提供合法席位,让中国登上国际舞台。③应该全面推进日中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④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但对日本来说不可回避,而且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①并进一步提出,应抛弃“小手小脚,只解决细节问题”的“归纳法”外交,采用“演绎法的外交手段,即:首先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确认对待和平的基本的共识,从大局、基本方针政策来落实,然后才涉及细节问题。只有按照这种演绎的方法来进行,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捷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②。又说:“但现在佐藤政权显然没有这种意识,中国也不会理睬佐藤政权。为了顺利解决这个难题,我希望包括公明党在内的在野党能团结起来,承担起这个任务。”^③冷战之中的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是美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堡垒,也是限制、孤立中国的“竹幕”之一部分,在法律上还没有和中国结束战争状态的1968年,池田的倡言可谓大胆而具有前瞻性。

二、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

这篇公开讲演稿和同年12月在《亚洲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倡言》的长文,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迅速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中日邦交的恢复,早在“池田倡言”发表之前,在池田大作的领导下迅猛发展的创价学会就进入了周总理的视野,周总理在60年代初就曾指示:“创价学会立足于日本民众,应予以重视,与其联系”^④。正因如此,周总理开始密切关注倡言提出后的日本国内动态,并委托作家有吉佐和子女士转告池田大作,“希望池田大作会长将来访问中国,我们邀请。”这令池田非常感动,表示“将来一定会考虑这件事。这个情谊不会忘”^⑤。虽然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4年年末池田第二次访华期间,但两人的情谊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芽。当时周总理已病重,但表示池田大作“一定要见”^⑥,

① 前原政之著,催学森译:《池田大作——行动与轨迹》,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71页。

② 蔡德麟著:《东方智慧之光——池田大作研究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③ 卞立强编译:《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④ 前原政之著,催学森译:《池田大作——行动与轨迹》,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73页。

⑤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第13卷),转引自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⑥ 卞立强编译:《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在会谈中他托付池田：“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的交往。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并在告辞之际拖着病体将池田送到大门口。归国后池田大作在亲手创办的创价大学的校园内栽种了樱树纪念，命名为“周樱”，这就是后来赠给邓颖超女士的诗中所写到的“友谊樱”的典故由来，成为中日外交史上一段佳话。

三、公明党访华和“竹入笔记”

有了“池田倡言”和周总理与池田大作、创价学会的交往打下的基础，加上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政治家松村谦三的牵线搭桥，周总理没有邀请同是共产主义立场的日本共产党，而是邀请了池田大作创立的公明党访问中国。1971年6月到1972年7月间，公明党三次访华，并在第三次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对会谈的全部内容仔细地做了笔记。这就是“竹入笔记”。在那个因意识形态和国际局势而造成的相对闭锁的时代，“竹入笔记”把记载着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总理亲自谈到的有关恢复日中邦交等许多内容的笔记展现在日本领导人的面前，这样，公明党就成了幕后的推手，推进着日中的秘密交涉，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复交。

四、中日复交和池田大作对中日友好所做的持续不懈的努力

虽然中日最终得以恢复邦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就是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之后，美中越过日本的头顶进行“握手”，迫使日本不得不迅速改变外交政策，但“饮水不忘掘井人”，池田大作和公明党作为首倡者，在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如田中角荣首相后来回忆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由政府最后完成的，但在野党为这一事业铺设了路基。”^①

1972年9月27日，中日邦交正式恢复，但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以及公明党为中日友好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停止，自1974年5月实现第一次访华至今，池田大作进行了十次访华，为建立巩固的日中友好“金桥”而亲力亲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池田大作一直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密切的交往。从迟至1978年10月才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其背后都有池田大作和“民间外交”的影子。在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陷入低谷之时，也是作为联合执政党的公明党充当了中日两国政府间沟通交流的渠道。可以说，正是池田大作四十余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中日邦交在波浪起伏中驶向光明的局面。

^① 蔡德麟著：《东方智慧之光——池田大作研究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和平出现于爱惜生命的地方^①——池田大作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池田大作不仅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促进日中友好为己任,就像他在倡言中所说的那样,他把中日友好看成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他从一开始就有放眼世界的胸襟和眼光。池田先生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民间政治家、外交家的立场上,而是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世界各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始终如一的和平主张

池田大作对中学生说:“所谓人权就是人不欺负人。”^②池田大作从彰显生命尊严的根本目标出发,反对与根绝一切暴力与战争,倡导积极的和平主义、追求绝对的和平主义、奉行彻底的和平主义,从而提出了独特的世界和平观。^③池田大作在少年时期亲身见证了战争的灾难,并且经历了丧兄之痛,这使他对战争产生极度憎恶,并促使他心中萌发对和平的向往。在与恩师户田城圣相遇并加入创价学会之后,他以佛法人道主义为基础,反思近代以来的世界战争史,提出了应该以“人类主权”代替“国家主权”的独特的世界和平思想。池田认为一味强调国家主义造成人民盲目以“为国牺牲”为最高归宿,这完全是“颠倒黑白”。^④认为人们爱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社会,使其进一步发展是一种美德,但一旦卷入国与国的对立,就会染上邪恶的色彩。尽管权力原本应该是为了人的尊严服务的一种手段,但其结果却刻画出了人类悲剧的历史。怎样克服这样的国家主义逻辑,使人类主权逻辑提升到思想的制高点,怎样更好地去构筑一个防止战争的国际和平环境,成了池田大作毕生研究的课题。

池田大作注重通过开展民间外交推动世界和平。他提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不应只限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应站在永远性的层次上,“文化交流”、“教育交流”、“青年交流”将会愈益重要。他希望凭借真实的人与人的友好交流,进一步巩固和平的基石。池田大作认为,民间外交可以克服政府间外交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可以超越政治矛盾,能够有弹性,是通过超越利害关系、呼唤和平的民众间心

^① 《和平之行进》,见池田大作著,《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② 前原政之著,催学森译:《池田大作——行动与轨迹》,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82页。

^③ 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④ 圣教新闻关西编译局:《向着和平的新世纪》,圣教新闻社,2000年版,第230页,转引自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与心的交流,奠定牢固的信赖和友情。并指出:“没有人民群众的团结合作,想要取得和平是多么不容易。对此,历史经常提示我们。”“我们可以通过人民群众之间强大的信赖渠道来防止国家间发生可以预见的幸事态的。”^①

池田大作认为,只有通过民间的交流,在民众中确立包括人类在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此为目标,才是使世界从对立、对抗转变为和平、和谐的大前提。关于这一点,池田提出“地球民族主义”的概念予以说明。他说:“正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不同和肤色的不同,肯定就有利害关系的对立。但是,不论这一切是怎样的不同,同样都是人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站在这个共同意识之外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开辟出真正的和平和安全保障的道路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地球民族主义。”^②

二、矢志不渝的和平实践

池田大作不仅如此主张,还脚踏实地地展开了实践。迄今为止,他先后发表二十九篇“和平倡言”,做了三十九次关于世界和平的公开讲演。自1960年担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起,他率先垂范,积极开展“世界和平之旅”的出访活动,先后访问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75年,国际创价学会(SGI)成立后,他又担任会长。为了扩大“地球民族主义”运动,在与世界各地的创价学会会员进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续积极走访世界各国,并与各国领袖、政治家、文化与学术界代表(包括历史学家汤因比、外交大师基辛格博士、亚洲文豪金庸等社会名流)等会面、交流,广泛深入地探讨人类所面对的各种难题的解决办法,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力。

在池田大作推行“地球民族主义”等反战、和平理念和积极推动外交活动的同时,为时代和成见所限,难免要遭受一些困难和挫折,有时候甚至是赤裸裸的威胁。比如在1968年的“池田倡言”发表之后,池田就相继收到了恐吓电话和信件,大街上的宣传车也接二连三地攻击池田。^③但池田大作没有被这些困难和恐吓吓倒,抱着“最崇高的人生哲学不就是殉于信念吗”^④这样的坚定一路走了过来。由于池田大作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他先后五次获得包括联合国和平奖在内的世界级和平奖、二十多个国家的国家勋章,获得世界一百多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以及一百七十多所高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等头衔,并被誉为继甘地、

① 《创价学会指导集》,圣教新闻社,1976年版,第389页,转引自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② 《创价学会指导集》,圣教新闻社,1976年版,第386页,转引自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③ 前原政之著,催学森译:《池田大作——行动与轨迹》,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72页。

④ 蔡德麟著:《东方智慧之光——池田大作研究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马丁·路德·金之后的“非暴力人道主义者”。在美国还举办了将三人并列收入的展览。这一评价是对池田先生多年来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最中肯的褒奖。

我们要创造、充实不朽的生命^①——池田大作对文化和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

池田大作不仅仅活跃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他对文化和教育事业也一直非常重视。先后创立了“民主音乐协会”、“东京富士美术馆”。以此为中心,积极开展交流活动。1985年,池田大作邀请“丝绸之路音乐之旅”代表团访日。1990年,举办了为发掘和保护敦煌做出巨大贡献的“常书鸿、嘉煌父子绘画展”。1991年举办了“现在中国美术展”和“东方歌舞团”在日本的公演。1995年,举办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明宝展”,1998年、1999年、2000年“中国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京剧团”、“上海杂技团”先后实现了在日公演。以上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教育方面,池田大作创建了创价大学和创价学院,包含了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在本着“大学是为了没有上大学的人而设的”^②这种平民教育理念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交流活动。不仅作为保证人,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批赴日的6名留学生到创价大学留学,并且在1980年第五次访华时签订了北京大学与创价大学的学术交流协定,这样的协定在日本的大学当中是第一个。他先后走访了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八所高校,先后在日本会见了从中国各大学来的代表团,先后与南开大学等五十六所大学的代表团深入探讨教育问题。通过这样的交流,创价大学与中国高校的学术交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为中日之间高等教育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池田大作极为看重文化交流:“文化作为人类的固有行为超越了所有的隔阂,净化着每个人的心灵。正是这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才是文化交流的出发点。”^③,作

① 《创造不朽的生命》,转引自池田大作著:《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② 前原政之著,催学森译:《池田大作——行动与轨迹》,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0页。

③ 《创价学会指导集》,第391页,创价学会学生和平委员会,《向着新“人类主义”》,第三文明社1991年版,第117页,转引自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8页。

为文化交流,其实就是要缩短“心灵的距离”,以人与人之间的整合为出发点。^①但是,他同时深刻地指出,单方面的文化传递,反而会在文化输出国的国民心中播下傲慢的不幸种子,反过来其结果是会在文化承受国的国民心中萌发出屈辱感,有时甚至是憎恶。文化交流必须是“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强调相对性、对等性和渐进性。这对现今以文化产品输出顺差巨大,就认为“文化软实力”超群而自傲的态度,不得不说是个警醒。

虽然目前对于软实力涵盖的范围学界还不能给一个明确的划分,但约瑟夫提出软实力的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和外交政策的威信,依然是普遍公认的较为客观的评定准则。^②从池田大作在促进中日友好和推进世界和平所做的巨大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间人士是如何用实践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的。

作为日本软实力的首倡者,池田大作对日本软实力所做的贡献,主要在日本外交政策改变和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促进中日友好、推动世界和平的表现,不仅充分体现了民间外交的力量,改善了日本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也透过世界和平的呼吁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从而间接提升了日本的软实力。

而在文化方面,池田大作本身所倡导的文化,正是日本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他用与汤因比、季羨林、基辛格等大师的对话,用创办教育机构,身体力行地举行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了日本文化内涵,也一定程度上融化了文化上的“冰块”。虽然池田大作仅仅是一个个体,不能代表整个日本民族,更有一些人认为他从事的活动仅仅是宗教上的交流,没有普遍性,但孰能说,这些年池田大作不辞辛苦,远涉重洋,历访 50 多个国家,以著书、摄影、诗歌、演讲宣传和平,没有影响到世界的主流文化和他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看法?事实上,池田大作正用他的智慧、思想和不懈的实践推动着世界的文化建设和日本的文化形象。所以,我们认为池田大作在文化交流上所做的努力,对于世界了解日本文化的优秀部分,从而提升日本的文化软实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众所周知,战后的日本通过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外向型的经济机制、企业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都为别国提供了重要借鉴。在软实力的建设上,虽然它并不大张旗鼓宣扬软实力,却体现在其社会乃至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但纵观近年来,即使日本又是建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又是推行漫画外交,日本这个经济大国为何依然徘徊在政治大国的门外,并屡屡在国际上受挫?在中

① 《创价学会指导集》,第 391 页,创价学会学生和平委员会,《向着新“人类主义”》,第三文明社 1991 年版,第 117 页,转引自孔繁丰、纪亚光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68 页。

② 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 页。

日关系问题上,也是时近时疏,时稳定时动荡?这些,其实在很大程度归结于日本软实力建设上的偏差,所以,软实力对日本的发展依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于日本发展而言,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日本总体实力的一个指标。而近些年来,日本的军国主义时隐时现,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其和平外交的看法,其在朝鲜核危机、中国台湾问题、马六甲海峡问题、日韩冲突等中的做法,引起了亚洲国际社会的警觉和抵制,更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设置了障碍。^①同时,日本在反思侵略历史、战后经济补偿等社会性成长方面,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大国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些偏差,使得日本的外交政策、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在这时候显得尤为重要,也成为日本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和支持的重要凭据。而且,日本的文化吸引力并没有随着游戏、动漫产业的巨大出口顺差而同步提升,正是忽略了池田所提出的“对等”的、“启发性”的文化交流原则之故。因此,如何扭转日本软实力建设上的偏差,以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问题亟待解决并应提到日程上来。

其次,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日互相了解的纽带。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除了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实力,更要以文化为主的精神软实力的支撑。中日双方积极主动开展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两国文化的精华就是最好的例证。目前,中国加大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推广力度,发扬中国文化的精髓,如孔子学院、书法、绘画、京剧、剪纸、刺绣等这些中国五千年留下的文化瑰宝;而日本亦通过其一些文化品牌,如动漫、饮食等极具日本特色的相关活动开展等,推动中日关系。当然,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因此,关于加大力度制作文化交流节目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互联网作为21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软实力传播的重大变革,如今,互联网也应成为中日两国传播文化的新阵地,加深彼此文化的了解,争取在意识形态上能“求同存异”,而这些恰恰是目前软实力建设上最薄弱的。

总之,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大力建设本国软实力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池田大作用自己毕生走过的路对日本软实力建设所做的贡献,正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但软实力作为一种长期、隐性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单方面或个人的努力便能得到好的效果,它需要从国家到个人,从政府到民间,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国内软实力的研究和实践,任重而道远。

体现软实力方面的池田大作本人的功绩和思想还有很多,虽力求完善,却因资料、经费等多重因素所限而力不从心,在此只能作为抛砖引玉之考,以待日后进一步补充完善。

^① 郭树勇著:《大国成长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前書き

王 虹

はじめに

「ソフト・パワー(soft power)」とは「ソフト国力」、「ソフト権力」、「ソフト力」とも称され、「他人に影響を与えるすばらしい力」を指す。また、「ハード・パワー」と比べこれは、精神と道徳の訴求により他人が自分の行為基準、価値観、生活様式および社会制度を信頼するようひきつける魅力と感動力であり、その上に成り立っている同化力と規制力でもある。その中で、主に文化の魅力と感動力を含め、対外政策、イデオロギー、政治的価値観への影響力なども含まれているが、その文化的ソフト・パワーは国家ソフト・パワー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一部分である。

この理論はアメリカ、ハーバード大学大学院ケネディースクール教授であり、クリントン政権時代国防次官補を歴任したジョセフ・ナイ(Joseph Nye)が最初に提出したものである。彼は1990年『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政治学季刊)』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などの文献に「ザ・チェンジング ネーチャー オブ ワールドパワー(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や「ソフト・パワー(Soft Power)」などの論文を発表し、更に『不滅の大国アメリカ(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を出版し、「ソフト・パワー」という概念を浸透させた。その10年後ブッシュ政権の単独外交主義の頂点に出版された彼の『アメリカへの警告——21世紀国際政治のパワー・ゲーム(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2)』は、ソフト・パワー理論の代表作となり、アメリカのイラク侵攻に反対する者たちの論理的支柱となった。2004年に出版された『ソフト・パワー——21世紀国際政治を制する見えざる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はソフト・パワー理論をさらに充実させた。

日本はソフト・パワーに力を注いでいる国である。そしてソフト・パワー理論を提唱した第一人者は創価大学の創立者、現在名誉会長の池田大作といえよう。ジョセフ・ナイの説が世に出た翌年、池田氏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で講演を行った。そのテーマは「ソフト・パワーの時代と哲学」であった。彼は宗教の

角度からソフト・パワーの国家発展と世界平和に対する重要性を論じた。その後にはじめて、日本でソフト・パワーに関する研究論文と研究所が現れており、ソフト・パワー理論への研究が広まってきた。

池田大作が最も早く国際関係と「ソフト・パワー」の重要性に注目した理由は、彼の世界平和の価値を終始追求する信念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彼の世界平和観をまとめてみると、主に次のような特徴を呈している。一つは暴力の根絶、平和主義の提唱、もう一つはすべての戦争撲滅、平和主義の徹底追求、そして生命尊厳を重視し、徹底的な世界平和を履行することである。彼の世界平和観と理論は、彼個人の経歴と社会的背景以外に、人間主義の哲学観念、暴力反対の東方価値観理念、そして人間平等の仏教思想の上に成り立っ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池田大作の世界平和の価値追求と「ソフト・パワー」との接点は強制力や武力による解決論と違い、「兼愛非攻」「以德服人」の感動力と魅力にある。ハード・パワーとは軍事力や経済手段による他国への強制力であり、それとは間逆であるソフト・パワーは国家の文化や政治制度、価値観などによって他国を魅了し、説得する力である。池田大作がソフト・パワー理論に最も早く注目し、積極的に提唱した故の一つであろう。

池田大作が日中友好の促進、世界平和と文化教育交流への貢献をしたという遍歴をみれば、それは日本戦後ソフト・パワーの増強に不可欠な一部分であり、これは人為的故意的にすることではなく、日本のソフト・パワーに対する彼の貢献が、日中関係の発展とソフト・パワー構築に関する研究の参考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本論考は全面的に池田大作とソフト・パワー論を研究する趣旨であったが、中国での資料収集と環境など諸要素の制限があるため、次のように彼のソフト・パワー論に現れる三つの方面を中心として展開するものとした。

一、日中両国の友好事業において

1. 「池田提言」

1968年9月8日に開催された創価学会第11回学生部総会において、池田大作は講演の中で次のように提言した。(1. 日本政府应正式承认中国政府, 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努力。2. 联合国应该为中国提供合法席位, 让中国登上国际舞台。3. 应该全面推进日中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4. 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但对日本来说不可回避, 而且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 应抛弃“小手小脚, 只解决细节问题”的“归纳法”外交, 采用“演绎法的外交手段, 即: 首先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 确认对待和平的基本的共识、从大局、基本方针政策来落实, 然后才涉及细节问题。只有按照这种演绎的方法来进行, 我认为是解决问

题的捷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また、“但现在佐藤政权显然没有这种意识,中国也不会理睬佐藤政权。为了顺利解决这个难题,我希望包括公明党在内的在野党能团结起来,承担起这个任务。”冷戦中の日本はアメリカの指示に従って遠東地域で共産主義を牽制し、中国を孤立させるというよう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中国大陸との対峙状態が解けなかった1968年に、この池田大作の提言はいかに大胆であり、前向きな考えであったか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2. 周恩来総理との接触

池田大作の講演と同年12月『アジア週刊』に掲載され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提言」は日本国内で大きな波を起こしただけでなく、中国政府の高度な関心と呼んだ。当時の周恩来総理は日中国交正常化を重視し、「池田提言」が発表される前に創価学会を視野に入れた。60年代初頭、“创价学会立足于日本民众,应予以重视,与其联系”提言後の日本国内情勢を見守っていた周恩来総理は作家の有吉佐和子を通じて“希望池田大作会长将来访问中国,我们邀请。”这令池田非常感动,表示“将来一定会考虑这件事。这个情谊不会忘。”という言葉で池田大作に伝えた。両氏の会話は池田氏の二度目の訪中であつた1974年末ごろに行われた。当時癌を患っていた周恩来にとって、この会話は最初で最期のものとなった。会談中、彼は「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的交往。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と話し、会談後、自ら病体を支えながら池田氏を入り口まで見送った。池田氏は帰国後桜の木を植え、周総理を記念し「周桜」と命名した。これはその後、鄧穎超に送った詩歌に書かれている「友好桜」の由来でもあり、永遠に日中両国外交史に伝えら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3. 公明党訪中と「竹入メモ」

「池田提言」という地盤の元、周恩来と池田大作の会談や、創価学会との往来、政治家の松村謙三が架け橋的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となども功を成し、周恩来は公明党のみの訪中を実現させた。1971年6月から1972年にかけて、公明党は三回ほど訪中したが、その三回目に周恩来総理との会談が実現した。当時公明党委員長を務めた竹入義勝は会談内容をメモし、日本に持って帰った。これが現在でもよく知られている「竹入メモ」である。イデオロギーと国際情勢による閉鎖的なあの時代、「竹入メモ」は中国最高指導者一人であつた周恩来総理が日中国交正常化に対する見解を日本政府の前に示した非常に貴重な資料となった。こうして公明党は縁の下での力持ちとして日中両国の交渉を促進し、両国の国交正常化実現の幕を開けた。

4. 日中国交正常化および両国友好事業に対する池田大作の弛まぬ努力

日中国交正常化の実現にたどり着くことができた背景には数多くの要素